

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日俄四次密约

——近代日本“满蒙”政策研究之一

蔡凤林 著

ISBN 7-309-04630-0
(CIP) 数据在案
(京) 01-2008-0103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01-2008-0103

导论 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的是一条不断对外扩张、侵略亚洲各国的军国主义道路，给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的对外侵略政策，被称为所谓的“大陆经略政策”或“大陆政策”，其具体内容就是立足于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乃至俄国的西伯利亚，称霸亚洲，实现“日本亚洲盟主论”，进而与欧美列强展开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最后达到“皇化世界”的目的。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这一政策的形成，有着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复杂成因。本书揭露日俄为争夺我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所签订四次《密约》的内幕和过程，也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就此“政策”的形成原因，做一简要分析。

日本位于东北亚，太平洋西北隅，在历史上虽受中国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万世一系”的天皇政治传统，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个性和文明发展轨迹，创造出了在亚洲地区乃至在世界享有盛名的日本文明。

在古代，日本的国际交往主要在于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除了13世纪后半叶遭受中国元朝军队的两次大规模侵伐之外，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基本上是封闭而安稳的。尤其是自德川幕府（1603—1867）建立后的260余年

间，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与东亚各国相安无事。但是，到 19 世纪中叶后，随着西方列强借助坚船利炮在东亚地区组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进程的加剧，与其他东亚国家一样，日本也开始遭受巨大的民族危机，将军和大名们再也不能在日本列岛上安享幕藩体制带来的安逸日子了。

在近代以前，西方列强叩击日本国门的情况已时有发生，其中较早到达日本的是俄国商船。1739 年，俄国施潘伯格的探险船队驶进房总半岛海面；1792 年西伯利亚总督派遣拉克斯曼使节团到达北海道的根室，要求开港通商；1804 年，沙皇的特命全权大使列扎诺夫闯关长崎；1811 年，格罗夫宁指挥“戴安娜号”军舰强行进入国后岛，等等。俄国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手段闯关，但均被江户幕府拒绝交往。^① 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也把目光投向日本。1795—1796 年，布拉夫顿指挥的英国舰队曾两度来松前藩补充给养。^② 1808—1824 年，英国军舰、商船、捕鲸船多次叩击日本国门。^③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随着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欧美列强加快将东北亚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步伐，日本也成为列强觊觎的对象。1853—1858 年，美、英、俄、荷、法等国胁迫江户幕府相继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安政五国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严重损伤了日本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不仅导致日本坚守 200 余年的锁国体制彻底崩溃，而且和中国一样，也使日本逐步沦为半殖民地。

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警醒日本有识之士，开始考虑御侮图强的问题。早在 18 世纪末，面对俄国步步南逼，有人即已建议

① 宋有成著：《新编日本近代史》，第 65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② 桑田优著：《近代英国驻日外交官》，第 5—6 页，敏马书房，2003 年版。

③ 宋有成著：《新编日本近代史》，第 6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巩固日本海防。如藩医出身的工藤平助(1734—1801)十分关注俄国的动向。1781—1783年他写成《赤虾夷风说考》一书,要求“海防第一”,确保日本对虾夷(北海道)的统治。1875年林子平著《三国通览图说》,介绍朝鲜、琉球和虾夷等日本周边国家和地区,1786年又著《海国兵谈》,疾呼强化国防,阻止俄国南下,防备清军东侵。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日本人视为天朝大国的大清王朝的惨败,震惊日本朝野上下。老中水野忠邦警告幕府不能隔岸观火、无动于衷。在其主持下,1841—1843年幕府实行了以重振幕府权威和加强国防为中心的天保改革。诸藩志士也担心中国的“外祸”波及日本。1853年6月,萨州藩臣汤藤龙栋指出:从中国兵乱的情况可以看出,已经到了整个世界都发生兵乱的时代了。他预言“日本在十年之内也将发生战争”。有些志士在加紧苦思如何应对时局的危机。1842年,佐久间象山献《海防八策》,建议幕府兴办教育,起用贡士,构筑海岸炮台,铸造洋式大炮千门,建造洋式军舰,训练水军,强调“当务之急是仿洋式制造大量火器与造舰练水军两件”^①。1849年,明治维新先驱吉田松阴(1830—1859)著《水陆战略》,主张操练陆海军,加强海岸守卫,用大炮装备陆军,关注海外动向。受1853年培理“黑船”闯关的刺激,吉田松阴接连越级向藩主进献《将及私言》、《急务册》、《急务条议》、《海战策》等建议书,力主充实武备,锁国攘夷。^②一些关注海外或海防的书籍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在中国刻印出版的《万国公法》、《四国志》等书籍,在日本也成为畅销书,被大量翻刻、出版、发行。尤其是魏源的《海国图志》,被誉为“天下武夫必读之书”。此书自1851年传入日本后即被翻

① 河野日著:《日本精神发达史》,第215页,大冈山书店,1939年版。

② 《吉田松阴全集》第1卷,第298页,岩波书店,1940年版。

刻，至1856年各种翻刻本竟达22种，在幕末日本影响至大，像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明治维新先驱“皆以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①。面对近代以后西方列强的剧烈冲击，为御侮图强，日本有识之士献计献策，他们当中形成了所谓的早期亚洲主义，即联合亚洲国家抵御西方列强，挽救日本民族的危亡，保护亚洲各国的独立。这本是无可非议，应承认其积极一面。但是，这些“有识之士”的亚洲主义思想中起初就包含着依靠对外扩张、侵占邻国领土以抵御西方列强的不正当违道义的因素。例如，林子平虽然认为“南下的俄国对日本造成了最大的威胁”，因此必须加强海防，“水战、铸炮为海国武备之根本”，岛国日本的国防之要在强化海军军备，参照欧洲的样式造船，演练水军。^②但他同时还解释，著述《三国通览图说》的目的是“在于明确日本之三邻国朝鲜、琉球、虾夷地之地图”，一旦时机到来，“日本英雄率兵进入此三国时，能暗记此图以应变”。^③足见日本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扩张意图，并不是19世纪中叶以后才产生。1854年吉田松阴欲偷渡美国，事败，被长州藩厅囚禁入狱。在狱中，吉田松阴著《幽囚录》，从“善保国”，即维护本国安全的立场，鼓吹采取进攻型的自我防卫论：“善保国者不徒勿失其所有，又有增其所无。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取勘察加、鄂霍次加；喻琉球，朝觐会同；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取台湾、吕宋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圉，则可谓善保国者矣。”^④吉田松阴完

① 梁启超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史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第97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② 《大日本思想全集》第13卷，第11页，吉田松阴书店，1933年版。

③ 《海国兵谈·自跋》，见《林子平全集》，第388页，生活社，1942年版。

④ 《幽囚录》，见《吉田松阴全集》第1卷，第596页，岩波书店，1936年版。

整地提出了“南进论”和“北进论”，抛出了“大陆政策”的基本构想，20世纪前半叶，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基本上是按此思路展开的。

吉田松阴认为“失之俄美，取之亚洲”，才是日本真正的出路所在。1855年，吉田松阴在狱中写给其兄杉梅太郎的书信《狱是帖》中这样写道：“我与俄、美媾合，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①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同时随着西方列强在东北亚掀起新一轮的殖民征服浪潮，日本形势愈加紧急。在这种形势下，吉田松阴提出了先发制人、“以攻为守”的“保国”论调。他在1856年撰成的《武教全书讲录》中认为：“凡退守之法，若无进取之路，万万不可也。当今之时，筑炮台、铸炮门、海岸防御、准备异贼来犯等懦弱之举，不可保全神州也。早早去除苟且偷安之习，确定出征四夷之策，乃是主客先后之义也。”^②

1859年，因“安政大狱”，吉田松阴被幕府处死，但他的“失之俄美，取之亚洲”的扩张思想却被他的门徒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及井上馨等明治维新元勋继承下来，直接对明治政府制定大政方针产生了深刻影响，1868年，明治天皇终于颁布《御笔信》昭示臣民：“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③

① 《吉田松阴致兄杉梅太郎》，见《日本思想大系 54 吉田松阴》，第193页，东京，1982年版。

② 《武教全书讲录》，见《吉田松阴全集》第3卷，第133页，岩波书店，1935年版。

③ 《明治文化全集》卷2，第33—34页，东京，1968年版。

基础。为抵御欧美列强的入侵，日本应该在加强海防和改革内政方面下大力气，而不应转嫁民族危机、侵占邻国领土。这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思想基础之一。

古代日本人具有强烈的国家自豪感和优越感，这首先是除了日本在历史上从未被纳入过东亚传统“华裔秩序”这一国际体制中，日本民族始终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一重要因素发挥作用之外，还和标榜为“万世一系”的天皇政治有关。1884年2月，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森有礼即将离开英国，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日本人深爱其国之精神，虽经年隔地，亦不可磨灭……以余观之，似有两大原因：第一，日本国2500年间不曾为外国种族所征服，至今自由独立，是吾人追想而可夸于今者；第二，2500年间恒奉一统之圣朝是也……盖各国皆无如此奉戴一统之王室者，故我国人心感荣耀，亦属当然。”^①

其次，古代日本人长期受中国传统儒学影响，很早就接受了中国的华夷思想，7世纪、8世纪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华夷观念，自认为中国，以日本为中心看待世界。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依天皇的“教化”所及与否，将世界划分为“化内”与“化外”。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将日本人传说中的“苇原中国”视为丰饶而适合天孙降临的“中国”，以现实中的“八大洲”为世界的中心。尤其是1645年清朝军队攻入北京，入主中原后，日本人认为中国已转化为“夷狄”，如1674年林春胜（1618—1680）等人著《华夷变态》声称：“崇祯殡天，弘光陷虏，唐鲁

① 转引自向卿著：《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第23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仅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促灭朱明，盗窃神器，是君天下者夷也，非华也。”^①于是日本人以汉唐正统自居，自认为已成为中国，而其他国家都是“夷狄”，应拱卫日本，称臣纳贡，如德川家康在致明朝的国书中称日本是：“其教化所及之处，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师，无不分别上书输贡。”^②俨然以传统中国的统治者自居。中国和日本的“华夷”秩序的错位，也增进了日本人的优越感及统治世界的欲望。

再次，日本人的传统宗教信仰神道教也培育了日本民族的强烈的优越感。古代日本人认为，统治众神世界高天原的最高神天照大神就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祖先，日本民族的祖先则是臣属于天照大神的天界诸神。因此，日本民族是神的后裔，是所谓“天孙民族”；日本为神造之国，即为“神国”。像《古事记》、《日本书纪》及《神皇正统记》等古代重要典籍均有此方面的记述。既然如此，日本就是“世界之根本”，神的子孙、优秀的日本民族统治其他民族，使世界形成以日本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则是自然而合理的事情。神道教的这种国家观与民族观经过长期的宣扬浸润，已经内化融进日本民族的思想与价值理念之中。尤其17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古典儒学本身的衰落，官学朱子学面临包含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学”（或称“皇国学”）的挑战，再度焕发日本人的“神国”思想意识和民族精神，如“国学”先驱者契冲（1604—1701）强调日本固有的神道，理由是：“本朝乃神国也”，“上古之时，唯以神道治天下”。^③

① 林春胜、林信笃著：《华夷变态》（上），东洋文库，1958年版。

② 转引自向卿著：《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第6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③ 《日本思想大系 39 近世神道论 前期国学》，第315页，岩波书店，1972年版。

以上诸因素综合作用而造就成的“选民”思想顽固地钳制着众多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和政治意识，他们认为日本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自18世纪末以来，针对欧美船舰袭扰日本近海日益严重的现实，水户学著名学者藤田幽谷（1774—1826）鼓吹“天朝开辟以来，皇统一姓而传之无穷，拥神器，握宝图，礼乐旧章由未改”，“天皇之尊，宇内无二”，力主尊王攘夷，维护日本安全。19世纪把尊攘论体系化而推至极点的会泽安（1781—1863），以1825年“异国船驱逐令”前后骚动不安的形势为背景写成《新论》一书，宣称：“神州（指日本）者太阳之所出，元气之所始，天日之嗣，世御宸极，终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万国之纲纪也。诚宜，照临宇内，皇化所暨，无有远迩矣。”就是说，只有日本“照临宇内”之理而绝无受他人侵扰之祸。

1823年，日本著名思想家佐藤信渊（1769—1850）宣称：“皇大御国（指日本）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之根本，则全世界悉可为其郡县，万国之君皆可为其臣仆”，“以此神州（日本）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①佐藤又具体地提出侵占世界必须先占领中国的扩张理论。他说：今日万国中地大物博、兵威强盛者当“支那国”，“皇帝开辟他邦必先吞并支那”，“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以中国“满蒙”为扩张基地的称霸世界的战略，也是佐藤信渊最早提出的。他说，征服中国应先攻略“满洲”。“满洲之地与我之山阴及北陆、奥羽、松前等隔海相对者凡八百余里”，“顺风举帆，一日夜即可到达彼之南岸”。如得“满洲”，则中国全国之衰败必当从此始，“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他还具体拟定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为了“经略支那”，日

^① 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策》，载《日本思想大系45 佐藤信渊》，第426页，岩波书店，1982年版。

本宜在衣食充裕的东京、关西、中州、筑紫、陆奥等八地域实行“富国强兵”，得雄兵 20 万人；然后由天皇渡海亲征，先锋直扑江南，取应天府，以南京为临时皇宫之所在；录用中国人中之人才，大施“慈德”抚育中国人等。征服中国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①在明治维新前 50 年的 1818 年（清嘉庆二十三年），中国还没有在日本面前暴露出腐败无能之前，佐藤信渊就已提出如此具体的侵略计划和步骤，足见近代日本向中国扩张绝非偶然。而 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实质上是继承了佐藤信渊的扩张理论。

众所周知，16 世纪后半叶丰臣秀吉曾两次大规模入侵朝鲜，继而试图占领大陆。丰臣秀吉发动入侵大陆战争，其思想理论依据是自认为日本为“日神”，而自己就是“日嗣”。1593 年，他致函台湾高山国，宣称：“夫日轮所照邻，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虫，莫不受之恩光业。予际处慈母胎中之时日没，然有瑞梦，其夜已光满室，室中如画，诸人不胜惊恐……生长万物者日也，枯竭万物者亦日也。”^②依他看，日本既是日神，则山川草木、鸟兽鱼虫、天地万物无不“日轮所照临”，作为“日嗣”的他就应代表“日神”完成这一使命。为实现这一目标，丰臣秀吉制定的具体计划是：在占领朝鲜之后，自己渡海至中国，“留居”宁波，然后进兵印度；派丰臣秀次占领北京，领有京城周围百国（县），并拟在 1594 年迁都北京。丰臣秀吉的两次侵朝战争均以失败而告终，扩张美梦也随之破灭，但这两次战争是日本首次以“神国”之名进行的对外扩张，对后世影响极大。丰臣秀吉可以被认为是

① 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策》，载《日本思想大系 45 佐藤信渊》，第 430 页，岩波书店，1982 年版。

② 转引自郑梁生著：《明日关系史研究》，第 463 页，雄山阁，1985 年版。

日本“大陆政策”的最早实施者，其企图侵占中国，乃至称霸亚洲的大陆扩张构想也成为明治时代日本人引以为豪的历史记忆和扩张动力。19世纪70年代，“征韩论”甚嚣尘上时，被称为“战争启蒙思想家”的狂热军国主义分子福泽谕吉（1834—1901）就宣称：“1700年前神功皇后征伐三韩，丰太阁（即丰臣秀吉）出师已300年了，人民对此尚不能忘怀。至今日，世上所有征韩论足以证明日本人民追悼千百年之古代而不忘其荣辱。”^①

明治初年开始施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得欧美文明涌入封闭200余年的日本社会。面对汹涌而来的近代文明，日本人感受到自己文化的落后，这个时期的日本人是极度的自卑，其心态正如福田德三所描绘的，日本人“简直就像乡村姑娘来到东京上野火车站，看到摩登女郎后，感到自惭形秽，无地自容”。于是，出于对欧美文明的狂热崇拜，明治维新至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社会出现了从生活方式到思想意识方面全盘欧化的极端崇洋现象。当时甚至有人提议天皇接受洗礼，信奉基督教；日本人应和欧洲人通婚，以改良日本的人种；以英语取代日语，等等，对欧洲文明简直是如痴如醉，奉若神明，恨不得把日本列岛搬到欧美去。

19世纪70年代，日本朝野摆脱落后、赶上欧美的愿望强烈，明治政府不仅鼓励国民生活习惯全面欧化，对各种欧美思想涌入日本也采取放任态度。当时欧美流行的各种思想也随着物质文明向日本蜂拥而入，给日本思想界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德国冯·台

① 福泽谕吉著：《通俗国权论》（前篇），见《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第18页，岩波书店，1959年版。

尔曼和古奈斯特的国家主义、英国穆勒等人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法国卢梭、孟德斯鸠的天赋人权论、自由思想,美国的人道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欧美思想纷纷进入日本思想领域,赢得各自的信奉者和追随者。其结果是促进了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

表面上看,自由民权运动是以人民主权、自由幸福为旗帜,主张开设国会、制定宪法、减轻地税,以反封建反专制的面目出现,但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冲击,尤其是由于西方列强的武力侵扰,引发日本社会各种矛盾的爆发,才是引起此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因此,民权主义者们更注重的是民族矛盾的解决,即比起“民权”,他们更关心“国权”。1882年11月至1884年12月,自由民权运动达到高潮,日本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7次反政府的暴力事件。恰逢此时,中日关系因朝鲜半岛1882年7月的“壬午兵变”和1884年12月的“甲申政变”而日趋紧张,民权运动的上层领导人迅速抛弃民权论立场,转向支持政府的扩张国权论,即其明证。

1882年9月,民权派重要报纸《自由新闻》发表社论《大陆关系》,鼓吹将朝鲜“让与其他强国,对日本绝非有利”。要求政府加紧与中国对抗。^①1884年7月,中法战争爆发后,同年12月,《自由新闻》发表题为《处理朝鲜问题》的社论,要求政府“速派大兵占领朝鲜京城”,宣称解决中日争端“只能付诸武力”,鼓吹“若战机一旦成熟,即以我精锐勇敢之兵驱逐驻韩的中国兵,进而横渡鸭绿江,长驱直入,攻进北京”。^②《自由新闻》的另一篇社论《应向世界展示日本兵的威力》更疯狂号召:

① 芝原拓自等校注:《对外观》,见《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第367页,岩波书店,1996年版。

② 芝原拓自等校注:《对外观》,见《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第372—373页,岩波书店,1996年版。

“苟为日本男儿，就磨快你的刀剑，备足你的食囊，届时切勿怠误向世界显示我等赫赫的武力！”1883年6月，民权派领袖板垣退助回国后，号召党员拥护政府的对外强硬方针。民权主义者们的狂热扩张意识，胜过国权派。民权派的自由、民主的自由民权运动不仅被发动起来了，而且席卷日本全国，但结果是在当时丧权辱国的国内形势下，这一运动能量的释放在争取“国权”的幌子下，却被引向对外扩张的道路上。就是这些民权派主导了19世纪70年代的扩张思想，掀起了近代日本扩张主义的第一次高潮。1874年兵犯台湾，1875年制造“云扬号事件”，1876年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朝修好条规》强加给朝鲜，1879年吞并琉球，整个19世纪70年代，明治政府频频在东北亚地区制造事端，这与自由民权思想的变异——对外扩张思想的推波助澜有着直接联系。民族主义是贯穿明治时代的一个主线和时代强音，国权主义是“明治精神的脊梁”。民权派亦如此，他们自开始便把维护民族独立的任务和侵略朝鲜、中国结合起来，继承了吉田松阴“失之俄美、取自亚洲”的扩张主义思想。日本近代史上出现的特殊的国民群体“浪人”，被称为所谓的“民间志士”，他们是向大陆扩张的急先锋，1881年2月，原福冈县民权团体向阳社（1878年成立）改名为玄洋社。玄洋社的“玄洋”两字，取自九州北海岸的玄洋滩，含义是不忘越过玄洋滩，冲向亚洲大陆。1901年2月，又一“浪人”组织“黑龙会”成立，鼓吹“从事以黑龙江为中心的大陆经营大业”。建会宗旨声称：“兼顾东亚大局和帝国天职，为挫败西力东渐之势，实行振兴东亚之经纶，当务之急是首先与俄国交战，将其从东邦击退；而后将满洲、蒙古、西伯利亚合为一体的大陆经营之基础。”^① 这些“浪人”狂热地投身于“大陆经营”，在一定程度上

①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678页，原书房，1977年版。



玄洋社成员，前排左起第三人为玄洋社创建人头山满。成员包括：前田玄造、佐佐木高梧、大谷友次郎、小幡武敏、小幡武敏、小幡武敏、小幡武敏、小幡武敏、小幡武敏。

玄洋社成员在出征“满洲”之前练兵。成员包括：前田玄造、佐佐木高梧、大谷友次郎、小幡武敏、小幡武敏、小幡武敏、小幡武敏、小幡武敏、小幡武敏。

玄洋社成员在出征“满洲”之前练兵

资料来源：玄洋社，1911年。转引自：日本《朝日新闻》，1911年。转引自：日本《朝日新闻》，1911年。

也体现着试图与欧美争夺亚洲大陆的近代日本人的一般心态。《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的如下一段描述能较好地反映出此点：

“若对先觉之士所怀抱之大陆经营论稍加考虑，即可知其思想之根柢为热烈之爱国心与民族之自信心也。19世纪后半叶，滔滔帝国主义大波席卷世界之际，初得与海外交往机会之日本人，顿感本国国土与国力之微弱。以如此狭小之国土和微弱之国力与世界各强国相对峙，怎样保证国家之光荣独立，乃时时刻刻刺激着日本人爱国心之急切问题……倘若处于四海安晏风平浪静之时代，邻邦之支那、朝鲜又足以引以为凭恃，携其手共同对抗欧洲各国，或可保国家之独立。然而当今四海汹涌，东亚之安危，朝不虑夕，邻邦非但不示以友邦之实，自身亦老朽欲倾。而我唇齿相依之清、韩（二国）一旦为列强所侵略，我国必受其余波之振荡，存亡实难逆料。此一趋势，目下以洞若观火。拥有三千年光辉传统之我国，若不主动启发诱导邻邦实行改善，或直接在邻邦扶植我之势力，扩大我国防线，以保全东亚，则唯有坐视现今形势之演进也……各先觉志士痛感本国和向大陆宣扬我皇威国光之必要，于是抱定各自之经纶勇往直前，掀起复兴东亚之运动。‘大陆经营’之一语，正乃包容此一运动全部内容之词汇也。”^①

“浪人”大多是大亚洲主义、国粹主义、天皇主义等保守、右翼思潮的信徒。在内政问题上，这些人拥护天皇专权，遏制真正的民主主义，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们对东亚地区国际局势的变化十分关注，就是这些“浪人”团体督促日本政府对外采取强硬政策，鼓励政府一步步走上侵略亚洲邻国的军国主义道路，就此日本人自己也承认：“审视我国在东亚之国策，概由民间人士所奠定。此国策之实现，亦时常为民间志士诱导、促进之结果焉。庙堂之政治家于国家大事，常陷于优柔不断之境地，而民间志士

^①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310—313页，原书房，1977年版。

则鼓舞鞭撻之，强力逼迫之，遂使为政者不得不向国家高远使命而迈进。此类事例，真不胜数。”^①

另外，明治初年随着欧美各种思想涌入日本，欧洲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充斥整个日本社会。19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的对外观开始由“华裔秩序”观转化为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观。疯狂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福泽谕吉声称：“各国交际之道只有两条：消灭别人或被别人消灭。”甲午战争爆发后，福泽谕吉无比兴奋，不顾年事已高，到处发表演讲，鼓动日本国民支持这场战争，并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美化战争，煽动日本国民，他把日本侵华战争美化成“为人类幸福文明的进步而履行正当的天职”，称侵华战争是“谋求文明开化者与妨碍进步之间的战争”，“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②自由民权运动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中江兆民（1847—1901）也堕落为强权主义者。他声称：“说起战争，按学者的理论来说，不论对战争如何厌恶，事实上毕竟是不可避免的大势，而且喜胜厌败，乃动物之本性。不论虎狮豺狼以及昆虫之类，凡生活于天地间的生物，无不以猎取而谋生存。请看生物之中，越聪明的越勇猛；越愚蠢的越怯懦……所以猫捕鼠，是猫的义气。狼捕鹿，是狼的义气。”^③这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论。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等人的扩张主义思想对当时的日本社会产生强烈影响，他们的思想也代表着明治日本的一般性社会意识形态，为明治政府制定“大陆政策”提供了恶毒的理论依据，并转化为具体的方针政策。

总之，明治政府走上对外扩张道路，也与当时在日本民众中

①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4页，原书房，1977年版。

② 福泽谕吉著：《通俗国权论》（前篇），见《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第51—52页，岩波书后，1939年版。

③ 中江兆民著：《三醉人经纶问答》，第35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占居主导性地位的上述民族主义社会思潮有着密切联系。能够认为,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起源、形成和实施,也是日本民间上述病态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近代日本社会本身就是促使政府采取对外扩张政策的温床。

四 在诸多复杂因素交互作用下,明治政府参议木户孝允提出了

将朝鲜定为日本对外扩张第一个战略目标的“征韩论”。他在其1869年1月26日日记里这样写道:“明朝岩仓公出,垂问前途大事,因以数事进言……至重要之事有二:速定天下方向;向朝鲜派遣使节,责其无礼,彼若不服,则兴问罪之师,祈能大显神州之威……然后一变天下陋习,确定远大之海外目标。”^①随后,木户孝允致函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提议,目前,陆海军已具端倪,希望朝廷“以兵力开辟韩地釜山”。一旦动起干戈,不必急于求成。大致规定年年入侵,得逞一地后竭力经营,“不出两三年,天下必将为之一变。如行之有效,万世不拔之皇基将愈益巩固矣”^②。朝鲜是明治政府的第一个侵略目标,侵略朝鲜是日本实行“大陆政策”的关键一步,也是与本书内容密切相关的问题,故有必要予以详述。

19世纪后半叶,俄国的南下东扩威胁了日本“大陆政策”的实现,加剧了日本向大陆扩张的野心和步伐。1880年9月《曙新闻》登载文章说:“俄国一旦决定征略之意,其他诸国必将联合出击,朝鲜之地究竟将归何国所有,则不得而知。俄国对该

① 《木户孝允日记》卷1,第159—160页,东京,1931年版。

② 《木户孝允致大村益次郎》1869年2月朔日,见《木户孝允文书》卷3,第230—234页,东京,1931年版。